

住长江边高楼上,楼下是一望无际的长江。江边散步,几乎成为日常功课。无意中能遇到许多惊喜,譬如看到江豚,这家伙憨憨的很可爱,是一级保护动物,已到濒危状态。这些年保护长江,控制污染,禁捕,鱼类生态明显改善。大约是食物多了,罕见的江豚也经常可以看到。

不过这似乎是去年和前年的事,江豚出没,从我居住的房间,通过观鸟镜,能看见它们在江面上捕鱼。没想到今年又变得十分稀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很难再看到江豚踪影,江边修建了便于观望的“长江微笑驿站”,有个延伸出去的大平台,供游人站上看江豚。去年,还有前年,包括大前年,江豚时时出现,看的人很兴奋,用手指着大喊,七八条江豚在追逐的场面绝非罕见。

在北京很多年,我一直跟朋友们讲:北京的秋,最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这些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北京的。

经历了漫长桑拿天的潮湿炎热,盼望着秋天可以去户外走一走,充分享受北京的秋。

然而,今年北京的秋天,分外短暂。

短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早晨在床头打死一只蚊子,有血。晚上空调就开了暖风。前一天还是短袖T恤,第二天就穿上了羊绒衫,第三天又裹上外套。

背上被蚊子咬的大包很痒,想挠一下,但够不到。还要穿过三层衣服的屏障,很是沮丧,且混乱。

再加上一种伤春悲秋的心情。看见树叶掉落,

长江变化很大,鱼多,飞来的候鸟也多。几百只的鸬鹚,成群的白鹭、红眼鸥,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鱼是真多,因为禁捕,因为放生,秦淮河在这入江,水的流动引来很多鱼聚集。

放生的人喜欢在这放生,成桶的鱼往长江里倒。于是喜剧场景出现了,有人双手合十,一边念经,一边放生。有人举着抄网,奔来跑去在捕鱼。长江里的鱼太多了,虽然禁捕,偷钓者大有人在。用抄网捕,用小鱼钓大鱼,一条筷子那么长的黑鱼做鱼饵,能钓上很大的鳊鱼。鳊鱼很大,动辄四五十斤,把它拎上来很有技术含量,几乎就是一场搏斗。江边有负责禁钓的保安,偷钓的人很调

北京的秋冬之交

赵款款

天一冷,就担心没有食物可以吃,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种悲伤。

大家都在调侃北京人民不时髦,没有时尚的土壤。很大程度也是由天气决定的。从四月底到十月初,只需要短袖T恤。从十月底到来年三月,只需要黑色羽绒服。

我今年给自己买的巴恩风外套,松弛感短靴,眼看是要闲置了。适合穿裙子套短靴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天。这一天,我错过了。

江上的黑天鹅

叶兆言

在保安眼皮底下,巨大的鳊鱼也能弄上来。鳊鱼很凶狠,胃口极大,据说养鱼的最怕它,放两条鳊鱼,能把鱼塘的鱼全吃光。

今年气候十分反常,热的周期长,一周前还夏天,这两天突然转凉,直接往冬天奔。今天气温是9℃,在江边感觉很冷,风很大,完全是初冬的感觉。雨后割过的草地,一片青翠,嫩尖刚冒出来,很像初春时节。最让人吃惊的是在长江里,居然会有只孤独的黑天鹅。太不可思议,拍了一段视频给上海的陈村,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在瞎说。陈村立刻回复,说天鹅好看,无论黑白。

话说回来,虽然没有穿搭可言,但北京人民必须掌握一项技能:层叠穿搭,也叫“洋葱式穿衣法”。因为外面冷,

室内热。尤其进了商场、餐厅,空调开得很足,必须一层一层脱,每一层都得体面,不然势必忍耐汗流浹背的难受。所以,夏天洗掉色的短袖T恤,也别着急淘汰,还得穿在里面打底。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在北京的秋冬之交,i人们可以轻松愉快地社交。不用担心在办公室和同事尬聊,也不用担心电梯偶遇熟人到底说什么,有几句活话掌握一下,轮流说就行:今天好冷啊!怎么又降温了?今年的秋天又好短。

Smalltalk 信手拈来,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氛围。话怎么都掉不在地上,怎么说都有共鸣。

慢慢地,也就理解了那句老话: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幸好,还有个短暂的秋天可以感慨一下。

那冬天呢,冬天是什么样子?不好意思,北京的冬天随着供暖就进入了另一个层级。一方面,它很漫长,黑色羽绒服要一直陪着你。另一方面,你说它结束,它基本也就结束了。

在家里又可以穿短袖、背心,燥热的时候还需要吃根冰棍。干……一种铺天盖地的干,家里的木家具会产生裂纹,会想喝梨汤、鸡汤,加湿器也要开始工作。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国台湾三大收藏家。赵子瞻比李敖小20岁,李敖又比林衡道小20岁。赵子瞻说,林衡道脸圆国的,穿着很朴素,主要来找有关中国台湾寺庙方面的书籍,他是历史学家。而对李敖的印象是,看到喜欢的古籍总会叫老板过来问:“这本书你是从哪里收来的?”赵子瞻目睹李敖买到了罕有的《中国古典文学细微》上下二册,笑得灿烂极了。

赵子瞻的收藏爱好从五六岁开始。那时家里的前院租给媒体当办事处。那些担任记者的叔叔伯伯,闲暇时下棋、唱京剧、谈历史和对家乡的思念,是一班互慰乡愁的文人。赵子瞻耳濡目染,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着崇敬与热爱。

皮,总有办法避开。当然,有时候也心照不宣,甚至黑天鹅是不吃鱼的,它显然跑错地方。我为它的命运感到担忧,秋风萧瑟,照这么寒冷下去,小嫩草刚冒出尖,很快会枯黄,黑天鹅吃什么。雪莱有句很鼓舞人心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现在想想,真没办法励志,秋天刚来,冬天已经不远了。

喜欢钱锺书先生的诗,“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这年头,夏天太热,冬天又太冷。大家都希望春天和秋天能持久一点,可惜老天爷自有安排,以南京为例,或者放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是热个没完,冻得够呛。

陈村在微信中,对出现在眼前的青翠草地表示惋惜,说这是最后的萌生,马上就要封关,说他很讨厌冬天。讨厌又有什么用,天若有情天亦老,冬天脚步正在逼近。

苏州河边“淘”《猫鱼》

徐文

说来最是有趣,闲逛华东政法大学,竟然遇到了一场旧书市集。“旧书新知·淘书乐”像是一张特别的请柬,让我去赴了一场迟到的约会。

走进华政校园,迎面便是交谊楼——那红墙绿瓦在暮色中格外夺目,红色砖墙配着墨绿色窗棂,檐角还保留着精致的木雕,像是哪位画师打翻了调色盘,把最浓烈的色彩都给了这座折衷主义风格的老建筑。绕过交谊楼,思贤堂静静伫立,孙中山先生曾在此演讲。抱着书本赶往食堂的学生与我擦肩而过,空气里飘着书卷气和隐约的糖醋小排香,这大概就是大学最动人的味道。问路时,保安热情地指向苏河畔:“淘书乐就在前面,晚上八点结束,您得抓紧!”那语气,像在提醒要去赶一场难得的聚会。临走还不忘叮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看到红砖拱门右转,别错过河边的风景。”

“淘”是从踏进市集那一刻开始的。旧书摊沿着苏河岸一字排开,昏黄的灯光照在泛黄的书页上,仿佛给每本书都镀上了时光的包浆。我在旧书堆里翻检,指尖触到一本精装书时,心头忽然一跳——正是那本心心念念的《猫鱼》。封面上陈冲抱膝席地而坐,从花园溢进窗来的光洒在她的头发、脸颊、胳膊上,一袭蕾丝连衣裙在逆光中泛着柔光,卷发随意披散,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透过岁月望着前方。这分明是我少女时代在电影画报上见过她的模样,如今捧在掌心,有种与青春重逢的恍惚。翻开书页,陈冲这样描写她的姥姥——那位在上世纪50年代就编写过《吃的科学》的老人说过:“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懂得欣赏眼前的生活。”陈冲,从上学霸到金马影后,从好莱坞演员到专栏作家的一次次转身,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像苏州河一样,在时光中不断淘洗出新的可能。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菊花叫“百日菊”,又叫“百日草”,从夏到冬,能开一百多天,无惧酷暑严寒,生命力很顽强。它的个头不高,枝顶的花开败之后,侧枝就会萌发,顶端会开出一样的花来,而且比之前的长得更高。因此,百日菊又称“步步高”“节节高”,它的花语是“善良、纯洁和美好”。村里有名字的女性,名字中不少都带有“花”。菊花、荷花、莲花、秀花、翠花等,都是在山野溪涧能见到的普通花草,朴素、平凡、静默、顽强,应季而开,幽香美丽,好看又好养。每当重阳时节,我总很想念家乡,想念我的奶奶,她的名字叫“菊花”。

奶奶是小脚老太,沉默寡言,总穿着一件蓝布衫。虽然走路不快,能量却很大,家里养着三头猪,有好几片菜园子。奶奶总是在忙碌,不得停歇。奶奶的菜园子,什么瓜果蔬菜都长得肥壮。吃不完的豆角、茄子、南瓜、辣椒等,或送邻居,或在竹匾上晒干。奶奶手艺很好,食材只要到她手里,就会做出很精致的点心。有一种用红糖酒酿做的发糕,切成菱形,淡黄色,蓬松柔软,是我心里最温暖的记忆。每次放学回家,她总会在锅里给我留吃的,一小碗蛋炒饭,一块米糕,一碗甜酒酿,一个煮鸡蛋等等。因为是小脚,奶奶总是跪在地上干活,洗衣服、拔草、锄草。有

时挑着木桶,趑趄趑趄到地里浇菜施肥。奶奶没有读过书,但是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特别强。我家有一杆老秤,奶奶只要瞄一眼秤星,就能马上算出多少重量,知道多少价格。我们向人家借的粮食,去还

时,奶奶总是装得满满的溢出来,把秤打得翘上天,从不让人吃亏。那时,父亲虽说在乡里工作,我们也不能天天吃米饭,经常在米饭里面加番薯丝。每到饭点,几个孩子抢着挖下面的白饭,奶奶常常一个人默默端着饭碗,坐在灶灶边,就着菜汤吃番薯丝。

我家有个规矩,饭点前不能去串门,大人担心人家留我们吃饭。不过,永清经常在饭点到我家来,他是个孤儿。奶奶从来不说什么,还给他洗被子洗衣服。叔叔一家搬走后,隔壁搬来两个知青,奶奶常喊他们到我家吃饭。家里有吃的,我常悄悄送过去。奶奶明明知道,也装作没有看见。

哥哥是村里的“霸王”,奶奶常向人家说好话、赔偿,再把哥哥拉回去讲道理。一次,哥哥跟奶奶一起在自留地里,又追蝴蝶又捉蜻蜓,突然捅到了一个蜂窝,一群黄

1895年,英国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皇家科学院毕业,赫胥黎的学生,科幻小说的开创性人物)出版了一本轻薄的小书《时间机器》,书里的“时光旅行者”先是拿出了“比一个小闹钟大不了多少”的模型,然后又领着一众客客观摩“小机器的放大版”——“有的部件是镍做的,有的是象牙做的,还有的部分是用水晶岩加工打磨出来的。基本上快完工了,只差几根弯曲的、晶莹透亮的杆还没完成,放在长椅上,旁边还有一些设计图。”

这是人类对于时光机的初代想象。当时的读者据此“脑补”到的形象,恐怕多半与十九世纪末期可供多人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关。彼时,离第一辆商用汽车诞生(1888)还不到十年,所以威尔斯虚构的时光机器各种部件的质地和形状,还带着强烈的古典色彩,从文字上看很容易想象成古董老爷车和马车的混合体。不过,在2002年根据《时光机器》改编的新版电影里,时光机成了一台金光闪闪的机械球体,更符合21世纪的口味。小说《时光机器》出版之后将近九十年,罗伯特·泽米吉斯拍了《回到未来》三部曲,据说对于片中最重要道具——“时光机”的设计曾经几易其稿;起先是一台冰箱,人物需要借助核爆能量,才能从过去穿越回来;然后是一栋小房子,可以用卡车运走的那种;最后敲定的方案是在一辆跑车上加几件并不复杂的飞机零件。如果有办法做一个精确统计,我相信,拜这部风靡全球的影片所赐,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那辆德罗宁跑车就是“时光机”应该有的样子。

实际上,在那些关于时光旅行的虚构作品中,相应的规则,“语法”(参见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和伦理(著名的回到过去“杀死祖父、爱上祖母”悖论),往往极尽复杂,但其中出现的时间装置大体上都遵循与《回到未来》相似的原则:简单、家常、灵便。它可以是一台机器,一辆车,一只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也可以是一道旋转门(诺兰的《信条》)。

倒拨时钟,你会发现有三件事情是从二十世纪初同时开始进展的:形形色色的时光机器、时间装置在科幻小说/电影中出现;理论物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突飞猛进,在时空问题上刷新人类的认知与想象;以意识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叙事的兴起。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深远地改变了故事的创作者和受众的“时间感”。我们完全没必要弄清楚爱因斯坦或者霍金在想什么,单单是那些神奇的名词和意象——黑洞、虫洞、弯曲的时间、“多世界”(量子力学)、“时序保护假说”,就足以与虚构艺术中的“时空旅行”或者“平行宇宙”构成浪漫而有趣的呼应。重要的不是这些理论和假说的光芒能在多大程度上照进现实,而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已经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具备了在光阴的碎片汇成的长河中任意游荡的“幻觉”——你也可以说是集体进入了关于时间的幻想共同体。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习惯去隔壁串门那样习惯“穿越”,像接受一日三餐那样接受“时间循环”。

蜂劈头盖脸“嗡嗡”涌了过来。奶奶一边大声叫他趴在地上,一边奋不顾身扑到他身上,摘下头上的簪帽挥舞。哥哥安然无恙,奶奶的额头和脸被蛰得像馒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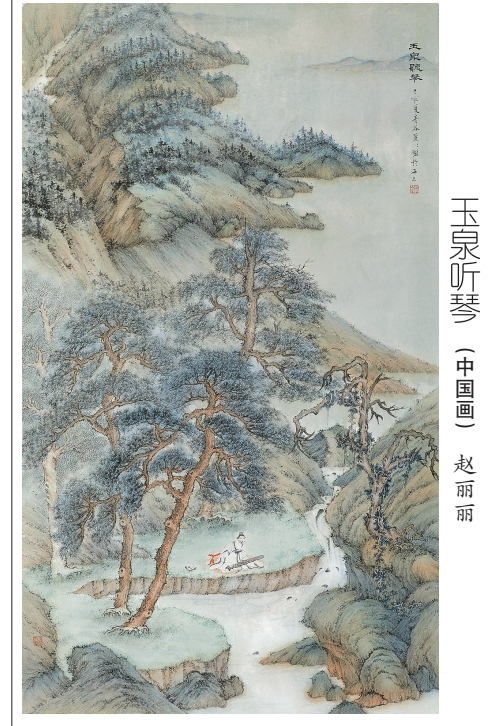
奶奶临走前最后一个月,拄着拐杖,这里转转,那里看看,无限留恋。奶奶的坟就在后山上的茶园,这里能看到我们的房子,看到村口人们来来往往,看到我们一个个长大走出村庄,又携妻带子回来。

善良是种子,能传承能发芽,在心灵的土壤中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奶奶在我们心里种的那棵树,一直在生长,哪怕遇到困难和风雪,它也没有枯萎和绝望。我和姐姐每次回老家,都会给村里老人送点吃的,塞个红包,听他们讲讲话。

重阳夜银光如水,皓月当空。百日菊摇曳多姿,在故乡的田野和山岗上开放。哥哥的外孙问他,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叫什么名字。哥哥对他说,那是保佑我们凡尘的寿星和福星。是的,那是大地的花朵开在天上,是向埋首人间赶路的人们,给予最温柔的良善和涓涓不壅的滋养。

现在,养老院就是我的家。重阳节是敬老节,对我来说,每天都在过敬老节。

重阳久久 责编:郭影



玉泉听琴 (中国画) 赵丽丽

与收藏家赵子瞻聊起在中国台北牯岭街、光华商场的地下室买旧东西的日子,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时牯岭街,从南海路这头到水源路那头,街道的一边是椰子树和尤加利树的树影微风,一边是矮房巷弄。那时牯岭街上有两百多家旧书摊和古玩字画摊,成为一道中华文化的风景。我曾发疯似的在牯岭街的旧书摊到处寻找白先勇的《现代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最后一期,当全部找齐了,那份满足感真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后来因都市规划街道拓宽,牯岭街的各类摊子大多搬去了光华商场的地下室。赵子瞻经常光顾牯岭街和光华商场的地下室。他与李敖、林衡道被称为中

牯岭街收藏痴

廖书兰

素,主要来找有关中国台湾寺庙方面的书籍,他是历史学家。而对李敖的印象是,看到喜欢的古籍总会叫老板过来问:“这本书你是从哪里收来的?”赵子瞻目睹李敖买到了罕有的《中国古典文学细微》上下二册,笑得灿烂极了。

赵子瞻的收藏爱好从五六岁开始。那时家里的前院租给媒体当办事处。那些担任记者的叔叔伯伯,闲暇时下棋、唱京剧、谈历史和对家乡的思念,是一班互慰乡愁的文人。赵子瞻耳濡目染,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着崇敬与热爱。